

“中国的脊梁”

——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李伯重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玄奘法师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是伟大的真理追求者。他把他的全部聪明才智、他的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他心目中的真理——佛学。他是一位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玄奘法师圆寂之后,这样的大丈夫已不多见。因此,读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名著,重温那古代“中国的脊梁”的光辉事迹,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玄奘;学术;志业;风骨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1.018

年轻时读鲁迅先生的作品,特别为他的一段话感到震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虽然鲁迅先生对佛教并无好感,但他说到“舍身求法的人”也是“中国的脊梁”。这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后不由得想到玄奘法师。

幼年时读《西游记》,对那个神秘的“西域”充满好奇。先君见状,令我读释慧立本、释彦棕笺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2]。先君说:

“佛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你现在不可能懂。你今天读这本书,可以跳过书中谈论佛教的内容,只要专注玄奘法师个人的经历就行了。你要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去了解他的一生。你读后肯定会感到有收获的。”于是我依照先君指示的方法开始读这本书。自此之后,我又多次读此书,每次都会受到心灵的震撼。特别是在“文革”十年中,精神上极度苦闷,在感到迷茫无助和对前途绝望之时,咀嚼此书中的玄奘法师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和为求知而不惧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

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序写道:“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

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3]可以说，是玄奘法师这样的先贤，支持我度过了那个悲惨和痛苦的年代，由于心中有他们作为榜样，因此也没有虚度年华，在逆境中依靠自学，读完了“我的大学”。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依然不时重读此书。随着年龄增长，对玄奘法师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虽然我至今依然不是佛门弟子，但对这位伟人的崇敬却与日俱增，确信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中，玄奘法师必然占有突出的一席。

二

年轻时对玄奘法师的敬仰，首先是源自他那对学问的热爱和为追求学问而一往无前的精神。

玄奘法师年轻时，为了学习佛学的真谛，遍访国内佛学重镇，求教高僧大德，学识已远超侪辈，成为中土佛学的翘楚。但是他觉得中国佛学水平和印度佛学水平仍有差距，“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决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于是决意西去求法，时年二十六。其时唐朝建立未久，边疆多事，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有人报亮云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亮惧，追法师问来由，法师报云欲西求法，亮闻之逼还京。”法师坚持西行，“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到瓜州后，“凉州访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法师又赶快逃走，一位熟悉西域道路的胡人老翁对他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达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斟酌勿轻身命。”法师回答说：“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

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持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出了玉门关之后，“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特别是到了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一路上还遇到盗贼，几乎殒命。就这样，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到达目的地——当时世界佛学中心所在的那烂陀寺。

在印度前后十七年，玄奘法师努力学习，掌握了印度佛教的大小乘各种学说，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师。当时印度正值学术盛世，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热烈的论战。玄奘法师针对佛教内外对大乘唯识学说的批评，用典雅的梵文撰写了一千六百颂的《制恶见论》作为回应。为了深入讨论，戒日王在曲女城举办了辩论大会，“遍诸天竺，简选贤良，皆集会所，遣外道、小乘，竞申论诘”。玄奘法师成为大会的主角，弘扬大乘佛教的义理，破除小乘佛教与外道的各种异见。“大师立量，时人无敢对扬。”最后，戒日王“将法师袈裟遍唱曰：‘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远矣。”可以说，这是自古至今，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最亮丽的表现。玄奘法师誉满印度，但他始终不忘初衷，婉辞了那烂陀寺的大力挽留，携带梵文佛教经论 657 部，又经历艰难险阻，回到中国。

三

玄奘法师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终生志业,为了寻求学问的真谛,他不仅不惜以身历险,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去印度取经,而且不慕荣利,把功名利禄视为草芥。

在西行取经路上,高昌国王麴文泰深慕法师的人品学问,提出“直以国无导师故,屈留法师以引愚迷耳”,恳请法师留在高昌国,“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法师坚辞,“王乃动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异途处师,师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相顺犹胜’。法师报曰:‘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因呜咽不复能言。王亦不纳更使增加供养,每日进食王躬捧槃。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感动了麴文泰,才放法师西行。

曲女城大会后,印度上层社会对玄奘法师大为敬佩,“(鸠摩罗王)谓法师曰:‘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法师见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坚拒了他们的盛情挽留。

玄奘法师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敬重。太宗“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乘俗务。法师谢曰:‘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辞,乃止”。他恳辞了太宗让他从政的盛意,唯愿毕身行道,“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

虽然学贯中西,名满天下,但玄奘法师译经依然殚精竭虑,一丝不苟。他“翻大般若经,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文既广大,学徒每请删略”。但他却“不敢更删,一如梵本。佛说此经,凡在四处。……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按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古来无比。……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努力人加勤恳,勿辞劳苦’。至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毕绝笔,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焉。合掌欢喜告徒众曰:‘此经于汉地有缘’”。

玄奘法师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他本人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篇幅浩大、翻译艰深的重要经典。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大唐西域记》这部研究中古时期印度和中亚历史和地理的最重要的著作。

玄奘法师是伟大的学者,这不仅是因为他学术精深,学贯中西,而且因为他真正热爱学问,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斯·韦伯在那篇脍炙人口的《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文章中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有“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信念,献身于学术而非利用学术谋求私利,“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只有这样,才会有对学术充满发自内心的热情。“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4]。玄奘法师正是这样,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问,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问,因此生前身后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四

玄奘法师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更是伟大的真理追求者。他把他的全部聪明才智、他的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他心目中的真理——佛学。

我少年时代开始读《三藏法师传》时,和大多数我的同龄人一样,对佛教不仅一无所知,而且充满偏见,认为那是“迷信”,因而不屑一顾,甚至盲目地反对。后来,随着知识渐长,偏见也慢慢消减,体会到佛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从而也渐生敬意。确实,佛教思想体系的宏大精妙,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罕有其匹。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对佛教的伟大也予以高度的肯定。“我不是一名宗教徒,但如果我是的话,我愿成为一名佛教徒。”^[5]

由于悟性低下,我至今还是未能领会佛学真谛,但是佛教的一些基本理念却令我深感敬服。《长阿含经》说:“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大般涅槃经》更进一步提出“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因此“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个“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之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也是中国儒家文化所缺乏的。

佛教以慈悲为本,《大智度论》说:“慈悲乃佛道之根本”,《观无量寿佛经》也说:“佛心者,大慈悲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长久的“黑暗时代”,在这四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国到处腥风血雨,血流成河,“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6]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原有社会秩序崩溃解体,使得广大人民陷于无边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在此时候,佛教的慈悲精神和为此采取的各种社会救助手段,给陷于极度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

的帮助。在佛教所倡导的福田思想的影响下,广大信众通过救助贫乏、赈济饥荒、举办斋会、施医舍药、殓葬贫民等方式,践行佛教倡导的“菩萨行”思想。这突破了以往中国社会中仅依靠血缘和地缘维系,对本团体人群进行的救助方式的局限,使得千千万万流离失所、绝望无助的人得到起码的救援,从而得以存活下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佛教在这个“黑暗时代”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精神支柱,以致儒家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韩愈痛心地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7]

在所有的宗教中,佛教是最具有和平精神的宗教,这已为人们所共许,^[8]这也许是它在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多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但只有佛教是不依靠政治、军事、经济的势力支持而传入并传播开来的。正是因为这种和平方式,大大减轻了中国人民对这种外来宗教的抵触,使它能够在广大民众心里扎下根,因此虽然有多次由统治者发动的“灭佛”运动,但佛教在民间依然香火昌盛。因为它已经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此后来也得到儒家正统的宽容和接纳。宋代儒学吸收和采纳了佛教的众多理念和思想,使得佛教也充分地融入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中。这也是外来宗教成功地成为广大中国人民普遍信奉的宗教的唯一例子。

由于佛教体现了一种与儒家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因此其传入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既有冲击,就有回应。特别是佛教关于“众生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和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儒家价值观是截然对立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后,引起固守传统的保守人士的强烈反感。早在南朝,范缜就做了著名的《神灭论》,痛斥佛教:“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演其妖书,述

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9]到了唐代，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之人物”的韩愈，也抨击佛教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0]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也说：“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11]因此，许多著名学者都坚信佛教就是祸国殃民的邪教：“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12]“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13]佛教流行，是“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溺于其教者，以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祸之大者也，其不为戎乎幸矣”^[14]。这种对佛教的排斥态度也导致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之祸”，即用国家权力禁绝佛教。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玄奘法师以毕生精力促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这对居于主流的儒家保守人士来看，无疑是传播邪说。但是，玄奘法师却为了追寻、捍卫和传播他所笃信的佛学真谛，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和《西游记》中那位善良、软弱、有点昏庸和无能的白面和尚“唐僧”不同，真实的玄奘法师仪表堂堂、聪明过人，不仅学识渊博、辩才无双，而且洞察人情世故，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玄奘法师的才干，受到多位君主的赏识和敬佩，其中就包括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域、印度，如果他要还俗出仕或者留在佛门之内成为“国师”，前景都无限光明。但是他却坚定不移地拒绝了各国统治者主动送上的“良机”，笃守初衷，潜心探求真理，将个人荣辱乃至生死都置之度外。这种为探究真理而牺牲一切的精神，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

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我想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把“舍身求法”的人也列入“中国的脊梁”，而其中玄奘法师无疑占有突出的一席。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玄奘法师就是这样一位“大丈夫”。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我觉得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五

玄奘法师圆寂之后，虽然还出现了像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的大思想家和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那样的大学问家，但像玄奘法师那样学贯中西、学识精深而又坚定追寻真理，甘愿为真理的引进、研究和传布献身、堪称“中国的脊梁”的“知识分子”却已不复多见。

到了宋代，真宗皇帝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励学篇》，为中国有志青年指出了一条走向未来的通途：“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自此以后，“一心只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信条。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入木三分的笔调，描绘出了当时“读书人”的人生百态。其中最能够体现他们人生价值观的，就是科举制度下的成功者周进对一位年轻学子所作的点拨：“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还有一位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马纯上（马二先生），对一位忘年交作了这样的忠告：“‘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

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换言之,出头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做官。由于科举考试严格限定读书范围,所以“读书人”的全部聪明才智就集中在怎么背诵四书五经,怎么写好应试文章。只要四书五经背得熟,八股文做得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样,他们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局限在建立在“三纲五常”等儒家教条基础之上的狭小天地中,即如《儒林外史》中王德兄弟所言:“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这个理。”^[15]

鲁迅先生对这种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但是,“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种情况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到了民初,虽然新式教育日益发展,但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思想依然强势存在。鲁迅先生说:“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

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所谓做“当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读书、做学问,都成为博取功名、谋求私利的工具。清代学者俞樾说:“今人以时文为敲门砖,宋人已如此矣。”^[16]鲁迅先生进一步说:“清朝人称八股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17]既然已经无用,还再要它作甚。倘若还要为学问、为真理吃苦,那就愚不可及了,“聪明人”绝不会为之。像玄奘法师那样舍身求法,为了追求学问真谛,为了寻觅人生真理,不惧艰难困苦,视功名利禄为敝屣的“不识时务”的人,也理该被淘汰出局了。在那些“识时务”的“俊杰”们大展身手的康雍乾时代,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出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意义深远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而沉醉在“康雍乾盛世”之中的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的伟大革命茫然无知,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这,应当就是回答“李约瑟难题”的一个答案吧。

到了20世纪,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爱德华·萨义德仍然感叹说:“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时获取巨利”,^[18]像玄奘法师这样的大丈夫已不多见。因此,读读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名著,重温鲁迅先生称为“中国的脊梁”的那些先贤的光辉事迹,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1]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本文凡未注明出处的文言引文,均出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

[3]傅雷:《傅雷译文集》(第1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年。

[5]《爱因斯坦所写自传的谈论中谈到:我不是一名宗教徒,但如果我说的话,我愿成为一名佛教徒》,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1159238/>。

[6][东汉]曹操:《蒿里行》,余冠英:《三曹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7][唐]韩愈:《原道》,韩愈:《韩昌黎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8]楼宇烈:《天台宗的核心是和合》, <http://ttnews.zjol.com.cn/ttxw/system/2008/05/21/010467317.shtml>。

[9][齐梁]范缜:《神灭论》,严可均辑:《全梁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9页。

[10][唐]韩愈:《论佛骨表》,韩愈:《韩昌黎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5-616页。

[11][北宋]欧阳修:《本论》,《欧阳修全集》(第1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8-289页。

[12][齐梁]范缜:《神灭论》。

[13][唐]韩愈:《韩愈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87页。

[14][唐]李翱:《去佛斋论》,王水照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7-12《全唐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4423页。

[15][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3、5、11、13、15回。

[16][清]俞樾:《焚时文》,《茶香室丛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7]鲁迅:《吃教》,鲁迅:《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反“漫谈”》,鲁迅:《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8][美]爱德华·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许可相关学术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